

“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今年先后迎来两位欧洲名导，波兰的克里斯蒂安·陆帕与德国的卢克·帕西瓦尔。他们都是第三度携作品与中国观众见面，都不以惨烈的场景制造视觉冲击，而是用各种声音“轰炸”观众的耳朵，让他们想象战争对普通人肉体和精神的重创。陆帕《英雄广场》指出纳粹阴谋并没随二战的结束而停止作乱，卢克《前线》则直接把观众带回一战的西线战场。

大概是想拉近当下观众与一战战壕的距离，《前线》被定义为剧场版的《西线无战事》。与德裔美籍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以及美国导演刘易斯·迈克尔逊1930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相比，《前线》并没有从普通德国士兵的视角展开叙事，而是把参加西线战争的德、法、英及比利时四国的士兵拉上舞台，让他们用各自的母语交错叙述个体在前线的生存与挣扎。他们讲述的内容，部分来自《西线无战事》，其余则综合了法国作家亨利·巴布斯的小说《火线》、比利时士兵的家书、英国将军的传记和战地护士的回忆录。

生命从鲜活到幻灭的相似经历，让观众无法仅仅把他们视为战争年代的特殊个案。《前线》排演的目的，诚如卢克所说，是力图全面、客观地展示一战对欧洲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造成的伤害。

展现战争的残酷，影视剧可借宏大的场景和触目惊心的细节，比戏剧占据先天优势。电影《西线无战事》及后来的同名翻拍版，使用众多不忍直视的画面，让观众“步入”真实的战场。卢克让演员自说自话的做法，某种程度上规避了戏剧在表现恢弘场面上的先天不足，却放大了戏剧向观众对面说出内心秘密的特有功能。

演员穿着整齐划一的现代服装置身于乐谱架前，俨然是以当下视角审视历史。当他们开口说话，仿佛渐渐被战争硝烟中的无名小人物“附体”。他们模仿着士兵在战壕中的动作，以及不时出现的沉默，宛若战士在身心疲惫中的短暂喘息。停顿与间离造成的复调与变奏，并不由音乐完成，却是靠演员大量与战争有关的独白成就。观众并不需要把演员说的每句话都听得明白，却会知道每句台词都由他们绝望的内心发出。

与这种看似单调实则蕴含能量的自述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舞台后方区域的一块金属板。它像卢克另一部关涉战争的《在大门外》里那面45度倾斜的巨大镜子一样，帮助观众建立对战争的荒谬更为具体的想象。不同的是，《在大门外》中的镜子将演员的表演同步反射呈现，近似机位固定在特定位置后的即时摄影，《前线》里的金属板则是多媒体投射的载体，湮灭于历史烟尘的普通士兵的首像与战争画面交替出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无名的，已被历史忘记。

金属板的另一作用，是充当发声器。它与演员或高地地讲话形成的音效，有时近似士兵内心的压抑达到边缘后的爆发。这些声音配合多媒体影像以及演员的肢体动作，彻底阻断了观众对战争所可能拥有的任何一点美好的想象。

剧中有场演员脱掉外套不停旋转的戏，他们越转越快，直至有人倒地而亡。这其实是将《西线无战事》中德国士兵的心理变化，扩延到四国战士身上之后的仪式化处理。被推上一战战场的年轻人不愿继续打仗，可是战争的脚步却将他们的个人理智踏平碾碎。而《西线无战事》里保尔为保护自己谋杀法国大兵之后的悔恨，亦是《前线》中四国战士的心声。他们本可以做兄弟，却要拼个你死我亡。

《西线无战事》着墨较多的书信，《前线》亦将之放大。书信联接士兵与家人对彼此的思念与牵挂，一旦中断往往意味士兵的死亡和家人的悲痛。借一封封也寄不出去的信件，卢克将战争带来的创伤，从前线扩展到千里之外，人群则由士兵扩大到他们的亲人——战争时期，每位平民都要准备着承受无法承受的精神之痛。

看似和平的年代，不见硝烟不代表没有战场。而善忘的人类，似乎很难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就像电影《西线无战事》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后，二战还是在1939年全面爆发。但出生于比利时的卢克没有泄气，带着对战争残酷的认识，以冷静的态度，他不断在作品中讲述着战争对人的戕害。

下图为《前线》剧照。 摄影：钱程、段超



白鹿归原忆忠实



著名作家陈忠实的离世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他的哀思，表达对一位当代作家的崇高敬意。这份敬意，不仅缘于他的代表作《白鹿原》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而且缘于他“端严正大、忠厚率真”的品格，缘于他始终脚踏实地、保持质朴本色的大家风范。陈忠实先生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他带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今天，我们组织了3篇纪念文章，分别由《白鹿原》的责任编辑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何启治谈他所了解的《白鹿原》的创作经过，由陈忠实生前的好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白烨谈他眼中的陈忠实，由陕西青年作家王晓云谈陈忠实对于文学后辈的扶掖，以期为读者朋友呈现一个更加清晰也更具温度的陈忠实。

——编者



一个本真的人

白 烨

陈忠实溘然长逝，在文坛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这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在于：一个作家逝世，在文坛之外引起的反应如此之大，当代少见，近年罕有；情理之中则在于：陈忠实不仅倾尽一生心力创作了长篇小说《白鹿原》，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而且他为人真挚，作风平民，在同行、读者中都享有较高声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纷纷对陈忠实表示悼念，既在于他的文，也在于他的人。

忠实去世已一月有余，这段时间里，常常如同过电影一般回想起有关他的种种过往，往事历历在目。我越来越觉着，他依然活着，就活在他的作品中，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初识陈忠实，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时，陈忠实刚刚发表了中篇小说《接班以后》，作品以清新而质朴的生活气息与当时流行的“三突出”作品形成鲜明对照，在陕西文坛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我就就学的陕西师大中文系邀他来校讲学，他以自己丰富而切实的创作体会，生动而形象地讲述了由生活到创作的诸多奥秘，使我们这些听腻了枯燥课文的学子大饱耳福。看着他那朴素的装束，听着他那朴实的话语，我开始喜欢上这个人，同时也对他有了第一个印象：本真的人。

80年代初我调到北京工作，思乡恋土的强烈烈念想一时难以释然，陈忠实的小说便成为我寄托乡思、宣泄乡情的重要对象。1982年间，《文学评论》编辑部约我为《文学评论丛刊·当代作家评论专号》撰稿，我思来想去还是选择了陈忠实。因为我差不多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在这一过程中，我与陈忠实通了好几次信，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心里感到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这篇刊于《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二期的文章，题目就叫“清新醇厚，简朴自然”，那算是我对他的作品的最初印象。

由初识到现在，已有40个年头。40年来与忠实的交往愈多也愈深，但所有的接触都无不在印证着我对他的原初印象：本真。我想象不出除了本真一词，还有什么能更为准确地概括他和描绘他。与陈忠实稍有接触的人，都会有人如其名的感觉。为人忠厚，做人实在，在陈忠实完全是一种天性的自然流露，这便得和他打起交道来，很自在、轻松与“不隔”。

同忠实在北京和西安聚过多次，但1984年夏季在北京街头一家饭馆的相会却至今难忘。那次忠实来京到《北京文学》编辑部办事，交完稿后打电话约我见面，我赶到当时位于六部口附近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见他，我们就近在长安街路南的一家山西削面馆要了削面和啤酒。那天饭馆的人很多，没有位子可坐，我们便蹲在饭馆外边的马路牙子上，边吃边喝边聊，看着来来往来的行人和车辆，聊着热热闹闹的文坛和创作，不拘形式也不拘言笑，惬意极了。

由此就好像形成了习惯，每次忠实来京，我们都去街头找



忠实先生的爱与愁

王晓云

陈忠实先生创造的作品已然凝固，他不会再修改其中任何一个字了。他以瘦削的身体，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精神世界。他的身体进入黄土，托体同山阿，也许化为秦岭上的一棵小树，也许变为白鹿原上的一片麦苗。但无论如何，他曾经存在过，他的轨迹是那样的振奋人心，还有着清晰的向度、温暖的质地。

听说，在计划写作《白鹿原》之初的1986年，陈忠实把自己置身于当时长安县、蓝田县的资料馆里，整天埋头查阅与乡土历史有关的史志。1988年清明节前后，陈忠实回到乡下老家的祖屋，开始动笔写《白鹿原》初稿。白鹿原上萧瑟的场景渐次展开，往日的荒凉隐藏着巨大的秘密。陈忠实安静下来，他吃着杂面，关闭门扉。在关上的一刹那，他看到了《白鹿原》中的人物：白嘉轩醇厚正大、朱先生高古圣达、鹿子麟机巧聪明、鹿三忠厚讲义气、孝文有着有文化人的底色；鹿兆鹏加入共产党的道路也并不那么一帆风顺、白灵个性刚直惨遭活埋、田小娥卑微而妖冶……在我看来，《白鹿原》并非只写关中，它写的是整个中国历史变革时期的一个缩影。有乡村、有城市、有宗族、有政治斗争、有男女情怀……陈忠实以那么丰富的表达，演绎了从清末到民国、到解放时期中国流变的众生百态。

正如所有的回忆文章一样，我也想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一些与先生的交往，而我想叙述的重点，是陈忠实先生对后辈的扶掖，以及他因为善良、因为宽仁，而自愿担上的精神重负。

2004年春，我的一个中篇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学刊物《钟山》杂志发表，继而被《北京文学》转载，我极为看重此事，便冒昧将杂志与文章寄给了陈忠实先生，并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他打来的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些兴奋，他说：“陕西的青年作家很缺，尤其是写小说的，你写得好，我高兴，你也给我们《延河》写个稿，给两个短篇小说，我配个评论，发个小专辑！”这是我在《延河》第一次发稿的经历。

《白鹿原》是怎样诞生的

何启治

5月4日，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副总编周绚隆，以及现在的《白鹿原》责编刘稚赶到西安，在陈忠实的灵堂前向他表示沉痛悼念。翌日清晨，我们便赶到市郊的西安殡仪馆咸亨厅参加吊唁活动。大厅前的广场挤满了自发前来吊唁的读者群众，有的高举着陈忠实的遗像，有的高举着不同版本的《白鹿原》。咸亨厅内高挂着陈忠实的巨幅遗像，在鲜花的簇拥下，陈忠实的遗体上庄严地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他的头下如他生前所愿枕着1993年初版的《白鹿原》。忠实遗像两旁的挽联为：“三秦文胆华夏风骨铸忠实人格笔蘸千钧担天道；终南气象灞原襟怀育白鹿精魂情含万汇传史音。”当我们一行在哀乐声中离开大厅，仍见广场上挤满了排队等候入场的人群；路上，仍见三五成群自发前来的读者。参加悼念活动的各界人士约有数千人。我们在为忠实的逝世感到无比沉痛的同时也略觉欣慰，因为我们由他的葬礼而看到文学在今天依然神圣。

回想我与陈忠实的初识，是在1973年隆冬。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当编辑，分工管西片文，西安自然是重点。一日，在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我拦住了刚开完会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来的陈忠实，约请他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陕西省作协向我推荐了陈忠实；也因为自我刚刚在《陕西文艺》上看到陈忠实发表的两万字的中篇小说《接班以后》，觉得已在关中平原上摸爬滚打十几年的陈忠实完全可以把它扩写为长篇；当然，还因为当时的人文社并没有可以发表中短篇小说的《当代》杂志（《当代》创刊于1979年）。大约他也感觉到我这个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高门楼”的编辑约稿的真诚，从此便记住了我，开始了我们长达40多年的友谊交往。

到1990年10月24日，我在陈忠实给我的回信里终于知道了他写长篇的一些信息。他在信里说：“关于长篇的内容……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劲……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能力的全部而为之的。究竟怎样，尚无把握，只能等写完交您审阅。”又说，“此稿87年酝酿，88年拉出初稿，89年计划修改完成……我争取今冬再拼一下。”他表示：“待我稿后我即与您联系。您不要惦记，我已给朱（盛昌）应诺过，不会见异变卦的。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绪作此事。”

我对陈忠实这连书名都没有透露但倾其全力而为之的长篇充满期待。后来，在1992年3月间，我终于收到陈忠实告诉《白鹿原》已定稿的信，他在信里询问是由他送稿到北京还是由我们派人去取稿。我和主管《当代》的副总编朱盛昌商议后，决定派当代文学一编室的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去西安取稿。大约3月25日，陈忠实说：“在作家协会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你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20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嗷嗷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泻出来了。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信中说了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立即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喜悦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颤栗。”

《白鹿原》在《当代》经洪清波、常振家、何启治、朱盛昌依次审稿并写下一致肯定的审稿意见，又在当代文学一编室经三位责任编辑（刘会军、高贤均、何启治）的三审后获得一致通过。我在1992年9月由《当代》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图书出版工作的副总编。在1993年1月18日的终审意见中，我认为：“这《白鹿原》是一部显示作者走上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宏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作为典型），使它在当代长篇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

《白鹿原》连载于《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单行本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3年6月出版，初版首印14850册。经过陈忠实的厚积薄发，勤勉创作，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6位编辑的劳动，《白鹿原》终于与读者见面了。面世20多年来，累计印数已达200多万册（主要是人文社出版的1993年初版本、修订本、精装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书系”、20周年紀念版，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忠实文集”、宣纸本、点评本等）。盗印本已接近30种，其印数也与正版相近。可见，说《白鹿原》的实际印数已达400多万册，当不为过。

回想《白鹿原》出版时的情景，可谓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一个作家一生的幸福，莫过于能为读者写出一部这样的好书来——那是不管有过怎样的争论，文学史都回避不了、也绕不过去的堪称经典的作品。

陈忠实是幸福的，也是光荣的。